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三重路径

——以孙冶方的学术研究为中心

林　盼

【提　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当代研究者肩负的重要时代使命。在探索这一宏大课题的历程中，经济学家孙冶方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范例。本文梳理孙冶方的经济学思想从萌芽、成熟到持续深化的演进历程，重点探析其理论体系赋能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三重核心路径。孙冶方立足本土建设实践与问题导向，突破“苏联模式”的理论局限，搭建了以“一线四论”为核心的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系统阐释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目标、运行机制与实践路径，为社会主义经济探索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该理论体系包含守正出新、联系实际、论辩求实三重路径，三者协同构成动态统一的理论发展整体。孙冶方对经济学理论的深度探索，为新时代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扎实的学理参考。

【关　键　词】孙冶方　自主知识体系　理论联系实际　开放视野

【中图分类号】F12

【作 者 信 息】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00836。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① 在中国经济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老一辈经济学家在历史发展的宏观逻辑、理论演进脉络以及实践探索的现实逻辑之间严谨校验，逐步踏上了探索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艰辛征程。孙冶方正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基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开展了独立的理论创造，构建了以价值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并在《社会主义经济论稿》中提出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形成了一套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框架。他认为，应当按照《资本论》的理论程序来研究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即依照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再到社会总生产过程的顺序加以推进，从抽象范畴过渡到具体现象，将价值概念与价值规律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每一个分析环节，这一思路不仅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架束缚，更能在计划经济与市场关系、企业自主权、价格形成机制等关键问题上给出具有前瞻性的见解。总体而言，孙冶方深切关注中国现实问题，探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体系，凸显了他将普遍原理与具体国情结合的严谨治学风范，他也因此被誉为我国"经济学界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②

关于孙冶方及其学术思想体系构建的内容，不少研究已经有所涉猎，主要是聚焦于他对于价值规律、流通理论及经济体制改革等领域的开创性贡献。③同时，部分成果也对孙冶方治学的基本原则与核心主张进行了梳理和归

①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

② 冒天启：《重新解读孙冶方经济学思想——纪念孙冶方诞辰 100 周年》，《经济研究》2008 年第 10 期，第 12 页。

③ 刘国光、张卓元、冒天启：《孙冶方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83 年第 8 期，第 19～31 页；刘国光：《彻底破除自然经济论影响 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模式》，《经济研究》1985 年第 8 期，第 64～67 页；张卓元：《孙冶方经济思想的重要现实意义——纪念孙冶方百年诞辰》，《经济研究》2008 年第 10 期，第 4～7 页；程霖、张申、陈旭东：《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经济研究》2020 年第 9 期，第 4～24 页；张开、王腾、李英东：《孙冶方价值理论的核心命题、理论根据及其评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 年第 2 期，第 31～40 页；张申、赵家杰：《孙冶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上海经济研究》2023 年第 12 期，第 88～98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纳。[①] 然而，对于他如何在实践中建构起这一知识体系的方法论，既有的学术讨论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深入探索。[②]

本文通过梳理孙冶方经济学思想从萌芽、成熟到持续深化的完整演进脉络，深入剖析其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三重关键路径。本文认为，苏联依托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形成了一套“苏联模式”，但该模式在数十年的运行中，逐渐滋生出一系列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弊端。孙冶方凭借深厚的理论积累与敏锐的问题意识，精准捕捉到“苏联模式”应用到中国的不适应性及其固有缺陷，进而以“一线四论”为核心框架，构建出一整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到具体经济环节的运行调节机制，孙冶方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与具体实现路径作出了清晰的理论阐释，也为中国后续经济建设的实践探索指明了方向。本文认为，孙冶方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植根于“守正出新”“联系实际”“论辩求实”三重核心建构路径：“守正出新”为整个知识体系确立了基本认知框架，“联系实际”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扎实的经验基础，“论辩求实”为完善知识体系提供了修正迭代的动力，三者各有侧重、彼此支撑，共同构成动态统一的有机整体。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解析孙冶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的内在逻辑与核心方法，以期为当前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兼具现实关怀的学术借鉴。

一、孙冶方擘画社会主义建设蓝图的分析框架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语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资本剥削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运行中凸显的各类非合理性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与批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形成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对替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运行逻辑与发展方向

① 董辅礽：《孙冶方同志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点滴》，《经济研究》1983 年第 2 期，第 12 ~ 15 页；黄范章：《积极倡导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家——孙冶方》，《经济研究》1983 年第 2 期，第 16 ~ 21 页；项启源：《概念不清或概念混淆是搞不好经济学的——从孙冶方同志“抠概念”说起》，《高校理论战线》2009 年第 7 期，第 22 ~ 24 页。

② 雍文远：《学习孙冶方同志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回忆一九六一年上棉一厂调查》，《财经研究》1983 年第 2 期，第 11 ~ 13 页；李卫：《调查研究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孙冶方学术探索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6 期，第 22 ~ 33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进行了富有远见的构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呈现出“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① 的社会特征。恩格斯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② 马克思、恩格斯的判断是，替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高度发展为基础的，可以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实现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

自建立之初，苏联就力求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作出的长远设想贯彻落实到本国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应当“消灭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③ 部分苏联经济学家也表示，社会主义是自然经济，“不需要金币和以金币为基础的纸币作为商品的贮蓄手段和估价手段”。④ 这些观点也影响了苏联经济政策的实施，例如 1918 年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要求禁止商品买卖、取缔市场经济，推行余粮收集制和面包配给制等，试图建立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虽然列宁对此进行了反思，认为“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⑤ 还要求实施新经济政策，倡导“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⑥ 但苏联的政策制定者仍然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只是特殊情况下的“退却”，或者说只适用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新经济政策的做法也就不适用了。列宁自己就表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越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⑦ 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⑧

从列宁开始，苏联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一般将其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其核心就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03 页。
② 同上，第 757 页。
③ 《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39 页。
④ 何建章：《评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模式》，《何建章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96 页。
⑤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70 页。
⑥ 同上，第 533 页。
⑦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534 页。
⑧ 《列宁选集》第四卷，1995 年，第 617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把最大部分的国家物资（原料、粮食、燃料、货币）集中在国营大工业手中，并有计划地分配这些物资，以保证依靠国家供应的各个企业的生产工作不致中断”。[①] 这种高度集中、以行政指令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凭借其强大的计划与组织能力，高效地将有限资源集中配置到那些关乎国民经济全局和长期发展的核心战略部门，例如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关键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并着力解决国家当时面临的重大、紧迫的战略性问题。在工业化基础薄弱、外部环境严峻、资本与技术相对匮乏的历史条件下，“苏联模式”在较短时间内，将长期受到落后生产关系束缚的社会生产力解放了出来，有力推动了国家工业化进程的迅速启动与大规模展开，并为其后续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然而，“苏联模式”在长期运行中逐渐显现出一系列结构性弊端，尤其是当这套模式整体移植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后，其内在的不适应性与固有缺陷愈发被立足本土探索发展道路的中国学者敏锐感知。1956 年之后，孙冶方通过一系列论文、报告，对“苏联模式”展开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

一是对国家计划的过度尊崇。孙冶方发现，“苏联模式”用一个统一集中的计划机关代替了原始部落经济中的首脑，领导着全社会的经济活动，“这里，规模是不同了，但本质还是一样的”。[②] “苏联模式”意在通过政治运动和行政命令，“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用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代替客观规律，乐道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情景，随心所欲地列‘纲’”，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离开了生产力以及必然地由它决定的生产关系，任意扩大农村公有化的规模，绝不意味着生产关系相应地前进，反而很可能是倒退，在社会主义、在公有制的招牌下，倒退到封建主义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去。”[③] 任由自然经济泛滥，就会“到处不计成本，不讲核算，不顾经济效果，企业以及整个社会流通迟滞，周转不灵，资产循环极慢，劳动效率低，经营管理差，社会财富浪费惊人，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发挥得很差”。[④]

---

①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论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再认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84 页。

② 孙冶方：《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再读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几点体会》，《孙冶方文集》第 4 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 年，第 274～275 页。

③ 孙冶方：《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孙冶方文集》第 7 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 年，第 160 页。

④ 孙冶方：《流通概论》，《孙冶方文集》第 8 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 年，第 49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二是对价值规律的肆意曲解。孙冶方发现，“苏联模式”否定了价值规律对生产活动的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价值规律的客观作用“必然是递减的”，特别是当“全社会实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之后，价值规律就干脆不存在了”。[①] 在这种情况下，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只能由国家统一调拨和分配，“国内经济流通领域内，生产资料却失去商品的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②] 由此，国民经济运行中各个部门、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的各类比例关系难以实现协调平衡，生产产出与市场实际需求相互脱节成为必然结果。

三是对企业生产的强制束缚。孙冶方发现，“苏联模式”由国家“多管了原来应该由千万个独立核算企业自己操心的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情，结果是使自己陷于日常事务圈子里，反而放松了属于国家长远建设方面的重大规划，即扩大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情和国民经济的平衡工作”。[③] 企业办理一项事务，需自下而上逐层上报审批方案，再耗费大量时间等待上级部门逐层批复，整个流程呈迂回周转特征，即便所有审批环节顺利通过，也早已错失开展经营活动的最佳窗口。经济运行本应具备的正常联系，被不同规模的行政系统与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划人为切割阻断，“依靠会计、统计来发号施令”，[④] 对企业技术升级进程与整体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升构成严重阻碍。

四是对“总产值”的盲目追捧。孙冶方发现，“苏联模式”以总产值作为核心指标，导致企业为完成较高的总产值考核目标，常常通过增加原材料投入与扩大固定资产规模堆砌产值，甚至会主动选择原材料消耗更大、生产成本更高的生产方案，罔顾生产活动为社会创造有效财富积累的事实，形成“重产值数量、轻实际效益”的生产逻辑，进而更倾向于生产耗用贵重原材料的产品。从表象来看，总产值指标可呈现出较为亮眼的增长，实际上却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无谓消耗，既不能为民众提供更多有效供给，也无法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积累有效资本，反而会导致企业经营机制逐步僵化，加剧资源错配问题。此外，“总产值”

① 孙冶方：《价值规律的内因论和外因论——兼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孙冶方文集》第7卷，2018年，第292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8页。

③ 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孙冶方文集》第5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第70页。

④ 孙冶方：《一九六一年我在上海作工厂调查时与市财政局局长顾树桢同志的往来》，《孙冶方文集》第6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第86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指标无法形成引导企业和部门围绕社会实际需求组织生产的有效激励：原材料一经投入便可计入产值，无论产品质量优劣、是否符合社会与市场的真实需求，均不影响产值“增长”的核算结果。因此，以“总产值”评价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指标结果必然存在“水分”，且在部分场景中“水分”占比极高。①

“苏联模式”出现上述弊端，是由于“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② 既然弊端丛生的“苏联模式”并非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答案，无法适配各国具体的发展实际，那么应当如何突破既有路径的束缚，擘画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孙冶方给出了他自己的一整套方案。

孙冶方从“红线”出发，构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逻辑框架。他认为，“苏联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一条红线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这条红线就是“最小—最大”公式，即“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③ 社会主义经济是由无数独立生产经营的企业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每个企业都可视作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细胞，只有让每一个生产经营单位真正践行“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最小—最大”原则，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现“最小—最大”的经济发展目标，才能提供扎实的微观保障和牢固的运行基础。孙冶方坚持认为，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生产关系，但研究生产关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合理的生产关系安排，实现劳动的最大节约和经济效果的最大提升。

在“最小—最大”理论的基础之上，孙冶方提出价值论、流通论、企业论和利润论。在价值论方面，孙冶方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④ 强调价值规律是调节社会劳动分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性规律，反对将其视为外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范畴。在传统理论中，价值规律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之后，价值规律自然就要退出历史舞台。孙冶方打破了这种教条化认知，指出价值规律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价值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反映的是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只要是社会化生产，就无法离开价

① 孙冶方：《从“总产值”谈起》，《孙冶方文集》第 4 卷，2018 年，第 141 ~ 155 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1979 年，第 542 ~ 543 页。
③ 孙冶方：《讲经济就是要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孙冶方文集》第 8 卷，2018 年，第 77 页。
④ 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光明日报》1978 年 10 月 28 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值和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经济依然要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办事。①

在流通论方面，孙冶方指出，流通不仅是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更是整个社会再生产得以实现的物质代谢与循环过程。社会分工的发展促成了生产的专业化，但若要使各个独立的生产部门持续、顺畅地进行再生产，就必须交换到与其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相适应的使用价值。交换过程中物质的新陈代谢是保证社会再生产持续进行、保持整个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绝对条件。即便在全民所有制内部的不同企业之间，也必须维系流通过程的顺畅与高效，这是保障经济整体协调运行的核心基础。②

在企业论方面，孙冶方呼吁，“在目前的全面调整中，在工业方面就必须彻底改变仍在实行的那种‘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设备管理制度”。③ 对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严格区分中央“大权”与企业“小权”，分界线为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简单再生产属企业“小权”，国家“多加干涉就会管死”；扩大再生产是国家“大权”，国家“不管或管而不严就会乱”。在划定权限的基础上，给予企业足够的经营自主权，让企业能够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和市场需求安排自身活动。④ 二是强化企业的独立核算。孙冶方反对将“不惜工本”“不计盈亏”视为天经地义的做法，认为独立核算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经营单位，将企业的权责划分清楚之后，“国家才能调动其积极因素，全面地把国家交给它的担子挑起来”。⑤ 他主张从“最小—最大”的角度，不断推进由企业主导的技术革新、技术改造。

在利润论方面，孙冶方把利润视为考核企业经营成果的核心指标。他认为，利润是物质生产部门职工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公共需要而创造的一部分物质财富，无论是社会总产品，还是个别企业总产品，成本越低越好，利润也应该是越多越好。他多次建议，利润应当成为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在价格合理的条件下，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完全是同义语，它们都是衡量企业技术水平高

① 冒天启：《价值规律内因论与商品生产外因论——〈孙冶方文集〉序》，《经济研究》2017年第9期，第4～10页。

② 孙冶方：《流通概论》，《孙冶方文集》第8卷，2018年，第45～62页。

③ 孙冶方：《必须改革“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设备管理制度》，《孙冶方文集》第7卷，2018年，第165页。

④ 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孙冶方文集》第5卷，2018年，第66～67页。

⑤ 孙冶方：《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若干理论问题的感想》，《孙冶方文集》第5卷，2018年，第141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低、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抓住了利润指标，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①] 他反对将利润视为资本主义专属范畴而加以排斥，指出社会主义企业利润是生产企业职工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公共需要而创造的财富，重视利润，便是重视生产效率、重视社会积累。他也始终强调，抓利润指标不是让企业脱离计划轨道，而是促使企业主动改善经营，更好地完成国家计划的整体要求。

我们可以看到，孙冶方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核心命题，进行了逻辑严密、框架完整的理论建构，大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整体方向，小到具体经济环节的运行机制，在发展的根本目标与实现的具体途径上，都做出了条理清晰的理论归纳，也为后续的实践探索指明了方向。他的“一线四论”，将“最小—最大”作为理论体系的核心红线，依次展开四个相互支撑的核心理论：通过价值论重新确立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破除传统理论对价值范畴的排斥性认知；通过流通论纠正将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的片面认知，强调商品流通对社会主义生产的重要意义；通过企业论明确独立经营的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构建适配社会主义生产的企业经营机制；通过利润论确立经济效果的核心评价指标，为实际经济核算提供清晰的遵循。四个核心理论层层递进、逻辑统一，最终整合为逻辑连贯、环环相扣、全面系统的坚实理论架构。[②]

“一线四论”是基于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实践经验，独立构建起来的知识生产、阐释与传播的框架体系。孙冶方认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既不能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概念来硬套，也不能用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准来衡量”。[③] 同时，这一理论体系是在服务国家发展、回应现实问题过程中，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研究方向、形成理论判断的自主成果，而在西方语境下倡导的学术自主性，本质上强调脱离政治与实践，由此可以看到，孙冶方不盲从西方教条、不固守既有结论，力求形成知识建构的主体性。与孙冶方同时期的学者，也从各自的角度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批判，但孙冶方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加以系统批

① 孙冶方：《在南、罗经济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孙冶方文集》第 7 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 年，第 8 页。

② 冒天启：《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孙冶方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11 ~ 146 页；董辅礽：《孙冶方同志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点滴》，1983 年，第 12 ~ 15 页；孙尚清、吴敬琏、张卓元、林青松、冒天启、霍俊超：《试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1983 年第 3 期，第 27 ~ 46 页。

③ 孙冶方：《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孙冶方文集》第 4 卷，2018 年，第 297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驳，并建立了自主性的知识体系和阐释标准。孙冶方曾指出：“如果说没有了‘价值这个概念’，对每一个个别产品的效用和生产费用的关系就无从观察，也即是说对于这产品的生产是否经济、是否合算，无从估计……那就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观点。”① 正如王亚南所言，孙冶方“可以称得上是价值法则这所伟大学校的校长”。②

受到理论局限和经验不足等问题的影响，孙冶方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观点上的偏差。例如，他在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性质进行分析的时候，承认全民所有制经济“难免带有一定程度的商品性质”，但在他的理论框架中，这种商品性来自外部商品关系的渗透，其本身属性仍是计划性的，商品性“不是基本的一面”。③ 他在论述价值规律时，将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交换关系排除在外，不承认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仍然具有商品属性，也没有预见到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曾指出：“现在有一种我认为不正确的经济学思想，那就是把商品货币关系引进全民所有制内部关系中来，就是以市场竞争规律，以交换价值规律来解释和指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些就是所谓经济‘自由化’的理论基础。”④ 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已经表明，即便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价值规律依然在发挥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这种作用不是外部渗透带来的结果，而是全民所有制经济自身运行的内在要求。对于这一问题，1982 年 5 月，孙冶方在报告中亲笔加上一句话，“生产的服务对象是消费者，不是仓库，过去只强调商业要有生产观点，不强调生产要有商业观点（即能卖出去），那是有片面性的”。⑤ 可以看到，孙冶方的观念也在变化之中，一些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诚然，孙冶方的这套理论体系存在一些不足，但它是中国学者自主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整体方案。他的“一线四论”以及对其他问题的阐述，从国

① 孙冶方：《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孙冶方文集》第 4 卷，2018 年，第 355 页。

② 林圃：《“价值法则这所伟大学校”的校长孙冶方——忆孙冶方的亲切教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评孙冶方的经济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380 ~ 381 页。

③ 孙冶方：《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孙冶方文集》第 4 卷，2018 年，第 305 ~ 306 页。

④ 孙冶方：《流通概论》，《孙冶方文集》第 5 卷，2018 年，第 232 页。

⑤ 孙冶方：《我们的经济计划要符合社会需要》，《孙冶方文集》第 8 卷，2018 年，第 247 ~ 248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民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及其动态运行的完整过程出发，进行了系统性观察与整体性把握。在孙冶方看来，理论唯有具备彻底性，才能真正拥有说服力与持久的生命力，而这正是每一位严谨的理论探索者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这一理论体系的局限性并不会遮蔽孙冶方治学遗产的核心价值，反而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本来就是在一代代学人接力探索、不断修正中逐步发展完善的，这也为当下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反思视角与经验参照。

二、守正出新：吸纳思想资源，构建理论根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① 孙冶方的理论探索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吸收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有益成果。他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自身逻辑出发，充分融通古今中外资源，在吸收已有思想养分的基础上直面中国问题、提出中国命题，搭建起契合中国实践需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这种不盲从、不迷信洋教条，坚持立足本土守正创新的探索，正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所在。

首先，孙冶方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资本论》的高度重视上。早在苏联求学时期，他便手不释卷，潜心研读《资本论》。他曾指出：“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重要著作（包括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一样，《资本论》不是浏览一遍就可以懂得的，必须经常地读，而且主要是在研究问题时去读，才能体会深刻。”② 他还总结道：“许多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犯了些错误，出了些问题，回过来翻翻《资本论》，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照着马克思已经看出的这个大的方向去做，这个方向我们没有体会到，很多方面我们违背了他的指示。”③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8 页。
② 孙冶方：《关于办好经济研究所的意见报告》，《孙冶方文集》第 5 卷，2018 年，第 185 页。
③ 孙冶方：《要宣传政治经济学——1978 年 4 月 24 日在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的报告》，《孙冶方文集》第 6 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 年，第 259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孙冶方不仅潜心研读《资本论》，更在学术研究中主动汲取其中的方法论智慧。他指出，“《资本论》的直接的研究对象，固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其“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的同时，也分析了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这些一般规律，就是恩格斯所说，去掉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余留下来的全部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应该从《资本论》中去好好学习的”。[①] 在孙冶方的设计中，《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目的，是要“构建一个类似于《资本论》那样学理性很强的、严整的理论体系，既包括基本原理，还包括对具体经济政策、策略的理论概括”。[②] 为此，孙冶方以“学而不套”的精神，牢牢抓住《资本论》体系构建的程序，“先分析生产过程，再分析流通过程，最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③] 逐步形成《社会主义经济论》的逻辑框架。孙冶方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以《资本论》为参照探究适应社会主义的研究思路，以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为研究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系统性继承。他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出发，坚守科学分析社会经济运行的根本立场，创立了一整套新颖严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造性推进，这正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守正出新”的生动体现。

从孙冶方的“一线四论”体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深刻影响。例如，“最小—最大”公式的形成深受《资本论》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④] 他还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⑤] 恩格斯在给《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也提到，“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学说可以归结为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作为报酬。这个原理也

① 孙冶方：《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孙冶方文集》第4卷，2018年，第344页。

② 刘明远：《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对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意义》，《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第27页。

③ 孙冶方：《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孙冶方文集》第4卷，2018年，第344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25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构成了贯穿这部著作的红线”。[①]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给了孙冶方极大的启发。他的研究根植于劳动价值论的体系之中，通过反复强调“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就在于如何以更少的劳动获得更多的产品”，[②] 将经典作家的理论成果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遵循，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节约劳动时间规律的基本原理，又打破了传统理论将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僵化认知，这也是孙冶方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原点和实践标尺。

其次，孙冶方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理论来源。他高度重视经济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与细致分析，在研究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尤为擅长挖掘和运用丰富的历史文献，以此作为论证自己核心观点的重要支撑。例如，他在 1977—1978 年的论文和讲座中，几次引述《红楼梦》，提到书中展现的地主官僚家庭里，那些成百上千的服役家奴也可以被主人当作礼品相互馈赠。孙冶方对此分析指出，这类人本质上仍属于地主官僚家庭内部的服役奴隶，真正决定当时社会经济面貌的劳动者并非这些奴隶，而是广大的个体生产者、农民以及手工业者。[③] 这也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相契合：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当时的基本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些个体生产者、农民及手工业者正是这一生产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在深入探讨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分期等重大历史问题时，不能仅停留于现象描述，更要回归根本，潜心研读并深刻领会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性质及其演变的基本原理。孙冶方强调，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本土的历史根脉，必须扎根于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中。这种“观古知今、述往思来”的学术自觉，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也让孙冶方的理论扎根于历史土壤，不致沦为无根游谈。

最后，孙冶方秉持开放包容的学术视野，从不排斥对国外有益学术成果的借鉴与吸收。他曾多次出访苏联、东欧等地，积极考察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17 页。

② 孙冶方：《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再读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几点体会》，《孙冶方文集》第 4 卷，2018 年，第 279 页。

③ 孙冶方：《评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孙冶方文集》第 6 卷，2018 年，第 195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济建设实践，也主动接触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成果。他反对当时将所有国外经济理论一概标签化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而全盘否定的做法，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张筛选吸收其中符合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合理内容，以此充实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认为，“西方经济学中有许多有用的东西，我们应该吸取，特别是经济计量学、部门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等方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他们在经济管理方面有许多好的经验”。[①] 1958 年，孙冶方在苏联访问时，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采用运筹学、线性规划等高等数学进行投入产出分析的方法研究，这令他深受触动。回国之后，孙冶方在报告中提到，将数学公式作为方法和工具研究、阐释经济问题，从马克思时期便已开始。运用数学这一工具，可以更精确地理解经济现象间的数量关系，掌握数量关系上的规律性，进而利用它们来为计划管理工作服务。苏联运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尚处于起步阶段，方法还不完善。但是，“这是任何新事物都不可避免的，正如新发明的汽车走起来比马车还慢。从发展上看，这个研究工作是有着光明前途的”。[②] 他还建议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内部设立运筹学研究组，并在经济研究所设立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小组，委派乌家培、张守一和甘兆熙三人专攻数学方法研究。

当然，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孙冶方从来都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他曾告诫乌家培等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犹如“虎口掏肉”，必须兼具胆识与智慧，既要巧妙地把蕴含科学成分的“肉”从虎口中取出，又要时刻警惕，避免在过程中迷失方向，“为虎所伤”，误入理论歧途。[③] 他认为，“我们只能利用经济计量学的数学方法，还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运用这许多方法。如果我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去运用经济计量学，那么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间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一同学了来，就会在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模式中间迷了路”。[④]

---

① 孙冶方：《也谈理论联系实际和百家争鸣问题》，《孙冶方文集》第 8 卷，2018 年，第 154 页。

② 孙冶方：《关于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问题的报告》，《孙冶方文集》第 4 卷，2018 年，第 295 页。

③ 李爱社：《乌家培：随时代发展屡有建树的经济学家》，《经济与信息》1999 年第 11 期，第 26～28 页。

④ 孙冶方：《在经济计量学年会上的书面发言》，《孙冶方文集》第 8 卷，2018 年，第 241～242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者，孙冶方认为，借鉴不是照搬，吸收不是同化，所有外来的理论资源都必须经过中国实践的筛选与改造，最终服务于中国问题的解决，这正是“守正出新”最核心的要义。孙冶方的探索过程充分印证了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守住根本，出新才能打破桎梏、回应时代，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融会贯通，才能生长出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理论体系。

三、联系实际：获取经验来源，确立问题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① 孙冶方正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力行者。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多次带队深入各地的工矿企业和乡村合作社调研。孙冶方认为，脱离了实际经济运行的经济学理论，不过是空洞的逻辑游戏。在革命年代，他深入调查研究农村经济，独立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现实状况；新中国成立后，他批判经济学理论中的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正是这种坚持人民本位、走向真实的经济生活现场，在田野中打捞真问题、在一线触摸真实经济脉搏的治学路径，让他提炼出了真正符合中国国情、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经济学理论，这正是他的经济思想充满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孙冶方从来都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不屑于“坐而论道”，而是极力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并身体力行深入田野、扎根生活。1948 年底，军区领导委托孙冶方为《大众日报》撰写一篇社论，主题确定为“生产不荒掉一亩地，救灾不饿死一个人”。他接受任务后没有急于动笔，而是先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带上警卫员一起前往基层进行了为期较长的实地调查，力求掌握第一手材料，使文章内容更加贴近现实、更具说服力。他的警卫员已经记不清他们在临沂地区查访了多少个村镇区乡，“只记得我们两人一个骑马，一个骑自行车；有时我骑车累了，他就让我骑上他的马，他骑自行车继续赶路。我看军区领导上对文章催得很急，劝他快点写出来，他总是耐心地说：‘写社论是要对人民负责的，情况一定要摸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第 21 ~ 22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清楚，数字一定要核实，千万不能有一点差错’”。[①] 孙冶方的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身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冶方认为，“搞理论工作的不研究实际，变成干瘪的理论，也要受到惩罚，我们的理论就会变得没有人听”。[②] 他曾评价有些经济学的论文，作者以为自己的研究是针对现实问题的有感而发，但是仍给人一种无的放矢之感，其原因就是作者对现实情况的了解是模糊的。这样的文章总是好像“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给人的感觉不够深刻。[③]

孙冶方不仅亲力亲为开展田野调查，在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还发动所内其他科研人员定期走出办公室，到田间地头“接地气”。他多次组织科研力量下基层进行实地调研，通过走访摸清经济社会的运行模式与现存问题，形成了多篇高质量的专题研究报告及工厂、公社调研报告。1961 年 2 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所的所务会议上强调，除了少数因承担特定外文学习任务而无法脱身的同志外，全所全体科研人员每年都必须保证有充足时间深入农村人民公社、工厂和商店等基层单位，开展实地调查研究，且每人每年的累计下乡、下厂时间不得少于两个月。

1963 年，孙冶方在另一份报告中鼓励同志们用功读书，同时希望大家深入工厂和公社基层，多做些调查研究，多列席财经业务部门会议，参加一些实际工作，领导层面也要为此创造条件。他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由衷地提出：“读书不得法会湮没在书堆中，联系实际调查研究不得法同样也会湮没在事物和现象中。既要读书，又要联系实际，而又不能湮没在书堆和实际之中，这就很不容易。但是不如此兼顾就决不能算是练好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功’，就不能做好研究工作，产生不出有价值的科学的成果。”[④] 他还提到，一些刚从大学毕业或是从业务部门调来的科研人员深感自己过去读书太少，希望能够“脱产”读书，埋头读了半年、一年或几年书（或者叫“补完课”）之后，再接受研究任务。对此，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功”除了读书之外，还要对现实经济问题做调查研究。[⑤]

---

① 鲜金城：《革命者的本色》，《孙冶方颂》，光明日报出版社，1983 年，第 83 页。

② 孙冶方：《要宣传政治经济学——1978 年 4 月 24 日在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的报告》，《孙冶方文集》第 6 卷，2018 年，第 280 页。

③ 孙冶方：《关于办好经济研究所的意见报告》，《孙冶方文集》第 5 卷，2018 年，第 185 页。

④ 同上，第 185 ~ 186 页。

⑤ 同上，第 199 ~ 200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针对仅赴基层开展浅表性考察即可完成研究资料收集的观点，孙冶方一直持否定态度。他指出，若开展调研工作时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与清晰的研究指向，最终形成的研究质量难以得到保障，也无法实现研究开展前预设的学术目标。孙冶方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经济研究机构开展的调研，在定位上与政府、企事业单位等业务部门的调研存在本质差异：业务部门的调研以回应具体的现实工作问题为直接导向；而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调研，其核心目标是回应经济学领域的基础性理论问题。据此，孙冶方提出，在开展田野调查与实地研究之前，完成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开展高质量调研的必要前提。研究者应当以经过审慎思考提炼得到的具体研究问题与探索方向为指引，进入真实的经济运行场景开展调研，不应在未形成清晰研究规划的条件下，仅凭随机性的动机盲目采集零散的一手资料。

孙冶方的这些想法，与西蒙、波兰尼的观点形成了呼应。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秉持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个体能够依托完备信息与纯粹逻辑推演做出最优决策。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理论指出，个体决策受限于外部信息的不完备性、人脑认知计算的生理上限与决策时间的现实制约，从客观约束层面界定了人类理性决策的边界。[①] 波兰尼的默会知识理论，则为有限理性的现实落地提供了核心认识论支撑。他将人类知识划分为可编码、可传播的显性知识与内嵌于实践、情境和个体经验的隐性默会知识，并认为在有限理性的现实约束下，个体无法仅依靠标准化、形式化的显性知识完成复杂、不确定场景下的决策，需要借助长期实践积淀形成的默会知识，凭借直觉判断、经验感知、场景辨识等独特优势，帮助个体快速筛选有效信息、简化复杂决策逻辑、弥补显性推演与信息储备的短板。[②] 孙冶方非常清晰地认识到，缺乏充分准备的调研，或许能够获得规章制度、数据报表等显性知识，然而无法掌握内嵌于行动、经验、身体感知、直觉、判断力，难以形式化、难以清晰表达的隐性知识。这些隐性的默会知识，需要建立在长期的情境体验、行业直觉、技能培养等基础之上。如果不对这些知识加以掌握，做出的分析和研判就难以准确、全面。

正是在一次次的深入调研中，孙冶方发现了问题，并致力于找寻破解的良方。他曾由衷地说：“在我所看到的中外经济学著作中，我关于固定资产管理体制的见解倒可以说是新的东西。然而这不是我的什么创见或发明。我的那些观点

① 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年，第 79～80 页。

② 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04～122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是来源于实践，特别是企业干部、群众的建议和要求。我不过是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和再生产的学说，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把企业干部、群众的建议和要求系统化、条理化了而已。”① 1961 年，孙冶方在上海走访企业时，多次听到基层的呼吁，希望能够缩短折旧年限，及时更新机器。这些来自一线的调研，奠定了孙冶方“企业论”的认知根基。他据此指出：“经过上海调查之后，我对固定资产管理体制问题的一些看法就更肯定了，而且也逐渐形成了一个观念，那就是对于折旧下放的主张，地方的同志，特别是基层的同志容易接受；管生产和技术革新的人赞成的多，管财务的人反对的多。”②

孙冶方对实际调查的重视立足于“人民本位”的核心理念，他曾说过，“我们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给中国人读的，当然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要尽可能多地引用中国的实际资料，讲中国的经验”。③ 基于这样的理念，他深入工厂车间，踏遍田间地头，都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调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使人民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因此，“孙冶方研究经济学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而是为了富国裕民，是用经济学来为人民服务”。④ 对于今天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而言，这种扎根实际、面向人民的治学态度依然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回应中国人民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提炼出真正接地气、解问题、回应时代需求的经济学理论，让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扎根中国大地，服务人民发展。

四、论辩求实：倡导百家争鸣，观点“求异存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

① 孙冶方：《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孙冶方文集》第 6 卷，2018 年，第 141 页。

② 孙冶方：《关于一九六一年我去上海做工业企业经济核算问题调查时同上海市计委和市委生产办公室几位负责同志的交往情况》，《孙冶方文集》第 6 卷，2018 年，第 83 页。

③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的讨论意见和二稿的初步设想》，《孙冶方全集》第 4 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年，第 5 页。

④ 宋涛、李京文、周叔莲、黄范章、戴园晨、冯秉珊：《纪念孙冶方逝世十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财贸经济》1993 年第 5 期，第 13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①] 孙冶方的理论体系，正是建立在充分的学术自由和“争鸣”之上。他“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商榷意见，公开检讨并放弃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自己认为应该补正的学术观点”。[②] 对于学术辩论，孙冶方的态度一以贯之。他鲜明地指出：“出头的鸟先挨打；出头的椽子先烂。联系实际研究政治经济学是极危险的行业，如果不肯人云亦云的话。但是马克思早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③]

孙冶方曾与于光远有过一次著名的“八二佳话”。1981 年，孙冶方参加学术会议时，发现与于光远在八个具体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见解，于是给他递去一张纸条，建议“我和你两个互相争论或批评（点名批评）一番，凑满十个指标”。[④] 之后，孙冶方就在文章中，引述于光远对国民收入统计指标的看法，直言“我不同意”，点名“同于光远同志商榷”，并希望其他人对他“也来个点名反批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中肯地研究一些问题”。于光远在回复意见之后，附上了一封回信：“我和孙冶方同志既是同行又是好友。在多数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不仅一致，而且十分投契。但是也常常在一些问题上看法相左，争得脸红脖子粗。”“我们有这样共同的主张：……我们认为指名的批评比不指名的批评要好。因为指名的批评必须有根有据，不好断章取义，而被批评者也可以进行说明或者反批评……”孙冶方看了不住地点头，说着“很好，很好”，并建议尽快发表。[⑤]

孙冶方与薛暮桥关于“概念”的认识之争，也是学术界的典型案例。在 1959 年第 1 期《经济研究》上，薛暮桥发表文章《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一些意见》，认为要“避免不必要的争论”。[⑥] 对此，孙冶方提出，经济学者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和价值规律已有数年，但对于核心概念的认识至今仍然很不一致，有必要厘清这些基本概念当中存在的认识混淆，因为概念上的混乱会给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16 日。

② 冒天启：《价值规律内因论与商品生产外因论——〈孙冶方文集〉序》，2017 年，第 10 页。

③ 孙冶方：《就计委和经济所的关系问题致胡乔木同志信》，《孙冶方文集》第 6 卷，2018 年，第 223 页。

④ 邓加荣：《孙冶方传》，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年，第 320 页。

⑤ 张天来：《学术讲坛创新风》，《孙冶方颂》，光明日报出版社，1983 年，第 41 页。

⑥ 薛暮桥：《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一些意见》，《经济研究》1959 年第 1 期，第 19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实践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他强调，在大众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时候，经济学者首先有责任帮助大家把资本主义这个“鬼”同“价值”和“价值规律”这两个概念分家。如果这些概念还没有说清楚，就得再讨论，所以不能笼统地说要避免卷入概念的争论。即使在学术讨论中，也可能出现一些不能触及问题实质的空洞议论，同样只能通过讨论来加以克服。①

还有和王亚南的观点争论。1959 年 5 月 15 日，王亚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该文末尾提到：“至于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否还要商品生产，是否还要运用价值规律来提高生产力，那不是我在本文里面所要回答的问题……我认为，商品生产是一个历史形态。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促进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来加速我们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更快地来完成两种过渡，因而辩证地达到消灭商品生产、终结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② 对此，孙冶方评论道：“我不反对王亚南同志去‘消灭’共产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虽则我以为如果表达得确切些，那么商品生产也不是被谁个所消灭的，而是让它也像国家一样逐渐衰亡的。但是王亚南同志在给价值规律下了如此的定义，对它的积极作用做了如此完善的描述之后，如何能硬派价值规律做商品生产的‘殉葬者’呢？你给它下的这个定义和作用的内涵同商品生产完全无同生共死的必然性呀！王亚南同志的这个结论完全不像从文章的内容得出来的，而是同整篇文章的内容相反对的。”③ 这段文字是孙冶方与王亚南关于价值规律的重要学术争论，集中体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理论探索与思想交锋。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对价值规律本质的认知分歧：价值规律究竟是商品经济的专属规律，还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通用客观规律。此次论争突破了传统经济学认知的局限，为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正确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对于同行或读者的商榷，孙冶方从来都是虚心接受。他喜欢同别人进行“点名”的互相批评，也很欢迎别人对他的主张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样做有利于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有利于经济科学的繁荣。1979 年，孙冶方在文章

① 孙冶方：《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孙冶方文集》第 4 卷，2018 年，第 319 页。

② 王亚南：《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1959 年 5 月 15 日。

③ 孙冶方：《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孙冶方文集》第 4 卷，2018 年，第 326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必须改革“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设备管理制度》中提到，必须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将折旧基金全部下放给企业掌握，且在原有协作关系范围之内，由企业自行处理供、产、销三方面的合同关系。文章见刊后，浙江省兰溪县的一位青年致信孙冶方，对其观点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企业管理不好、效益不高，不是由于企业自主权太少，而是干群关系发生扭曲、基层干部权力过大、随意改变分配关系所致。他担心如果再给予企业更大的管理权限，会影响普通职工的福祉。孙冶方收到信之后并没有生气，而是耐心细致地从来信的表述中找到有价值的部分，在另一篇文章中进行了回应。他指出，有观点认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扩大基层干部的权力，这个意见当然是不对的，“但说明了一个问题：经济民主化，必须由政治民主化来保证。企业扩大权力后必须有立法来保证群众的民主权利，使干部不能滥用职权”。①

由上可见，孙冶方在论辩的过程中，毫不遮掩自己的不同看法，也乐于接受反驳。他坚信自己的论述是富有科学性的，即可证实或可证伪。可以说，孙冶方一直将探求正确的经济理论视为己任，不放过任何一处逻辑漏洞。孙冶方临终留下嘱托，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希望经济所的老同事对他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② 于光远在纪念孙冶方的座谈会上表示，孙冶方的遗言，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学者对党、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责任感：“学术观点上的是非，只有通过学术界的讨论来解决。他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同事们身上，这是完全正确的。”③

纵观孙冶方的学术生涯，他秉持的“论辩求实”精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一贯倡导百家争鸣，主张“求异存同”，鼓励提出不同观点并进行争辩，从不回避他人的批评，且对不同意见持欣然接纳的态度。基于此，他十分乐意与同行开展深入且坦诚的学术论辩，认为论辩双方在学术地位上完全平等，不存在一方具有先天优越性或话语特权的问题。在论辩过程中，他身体力行，严格遵循文字论战的各项规则，将讨论核心置于理论本身的真理性、逻辑链条的严密性以及学术表述的完善

① 孙冶方：《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孙冶方文集》第 8 卷，2018 年，第 24 页。

② 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知识出版社，1984 年，第 138 页。

③ 宋任穷、薛暮桥、钱俊瑞、于光远、马洪：《在孙冶方同志纪念会上的讲话》，《经济研究》1983 年第 4 期，第 42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性上，并在此基础上，与其他学说进行客观比较和理性竞争。尤为可贵的是，他从不试图借助学术之外的力量或权威来确立对其他理论学派的优势地位，而是坚守学术对话本身的纯粹性与尊严。可以说，孙冶方“开放求是、吸纳灼见的治学态度，坚持来自实践而认准的观点至死不渝且又坦然放弃被实践证明是不大适宜的观点，在学界鹤立独行的铿锵风骨，是我国经济科学发展的宝贵财富”。①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孙冶方基于中国实践，以开放包容之视野、坚持真理之勇气，构建了契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留下的治学遗产，至今仍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精神源泉。从秉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到倡导学术争鸣、鼓励坦诚论辩，孙冶方的治学理念与实践，始终围绕解答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命题，锚定服务人民、富国裕民之根本目标。他一生的治学实践贯穿了对中国经济学自主发展的深刻思索与不懈探寻，这份坚守与追求，至今仍指引着后来者的学术方向。梳理孙冶方的治学遗产，不仅是对前辈学者的缅怀，更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学人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进程中汲取精神动力的重要途径，必将推动中国经济学在回应时代需求中持续开拓前行。

孙冶方在“苏联模式”之外，构建出一整套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他的“一线四论”，由“最小—最大”作为理论体系的核心红线，以价值论为基础，延伸到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国民经济管理的各个层面，② 形成了层次清晰、逻辑自洽的理论脉络。孙冶方曾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尚未完全形成，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产生到如今还不过几十年，我们的经验还不多”。③ 在“苏联模式”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情况下，孙冶方依据理论文献和实践经验，采取“论辩求实”的方法，率先站出来系统批判了僵化的自然经济理论和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突出弊端，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了扎实充分、极为重要的理论准备。当然，孙冶方的一些观点提法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的研究方法和钻研精神是超越时代的，对当下的研究者

① 冒天启：《价值规律内因论与商品生产外因论——〈孙冶方文集〉序》，2017 年，第 10 页。

② 冒天启：《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孙冶方纪念文集》，1983 年，第 111 ~ 146 页。

③ 孙冶方：《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再读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几点体会》，《孙冶方文集》第 4 卷，2018 年，第 271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具有启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①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努力。孙冶方构建的理论体系就是中国经济学探索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历史遗产。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从乡村振兴到产业升级，从数字经济发展到共同富裕推进，各类新问题不断涌现且无现成答案，更无法直接从西方理论框架中获取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我们更需传承孙冶方的治学精神，扎根中国实践、回应中国问题、融通古今中外，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新力量。

（责任编辑：张　婧）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 年，第 76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Three Pathways of Building China's Knowledge System in Economics: A Study Centered on Sun Yefang's Scholarship

Lin Pan

Abstract: Building China's knowledge system in economics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intellectual mission for contemporary scholars. In pursuing this ambitious intellectual undertaking, Sun Yefang offers a particularly valuable example.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Sun Yefang's economic thought from its initial emergence through maturation to continued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 three princip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his theoretical system contributes to building China's knowledge system in economics. Grounded in China's own experi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uided by concrete problems, Sun moved beyo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aints of the "Soviet model" and developed a logically rigorous and systematically structured framework centered on "One Guiding Thread and Four Theories". This framework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d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s,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by providing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hina's exploration of a socialist economy. Sun's theoretical system developed through three interrelated pathways: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while pursuing innovation,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seeking truth through critical debate. The three work together to form a dynamic and unifie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s a whole. Sun Yefang's in-depth inquiry into economic theory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building China's knowledge system in econom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Sun Yefang, building China's knowledge system in economics,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penness

Key Frontier Issues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in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Jia Zhenbo

Abstract: Against the contemporary backdrop of the accelerating interplay betwee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s,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awakening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